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总主编 / 李学勤 张岂之

主 编 / 吴汝祚

【考古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K210.3
Z150
:6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黄汇典

炎 黄 汇 典

总主编 / 李学勤 张岂之

主 编 / 吴汝祚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
【考古卷】
藏书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61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汇典·考古卷/李学勤,张岂之主编;吴汝祚分册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12

ISBN 7-80626-861-8

I.炎… II.①李…②张…③吴… III.①炎帝-人物研究-史料②黄帝-人物研究-史料 IV.K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973 号

YANHUANGHUIDIANKAOGUJUAN

炎黄汇典·考古卷

分册主编 / 吴汝祚

责任编辑 / 姜越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印刷 /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9.5 印张

版次 /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80626-861-8/K·191

定价 / 800.00 元(全八册)

邮购电话:(0431)5634146 5634356

邮政编码:130021

炎黄汇典

程思远题

《炎黄汇典》编辑委员会

主任:程思远

副主任:李宝光 冯 征 杜导正 戴 逸 李学勤 张岂之

委员:王贵民 王俊义 冯其庸 曲英杰 吴 塘 吴汝祚

宋文茂 宋元强 张志浩 罗 琨 郑杰祥 贾 芝

徐育民 鲁 諄

总主编

李学勤 张岂之

编辑部主任

鲁 諄 罗 琨 宋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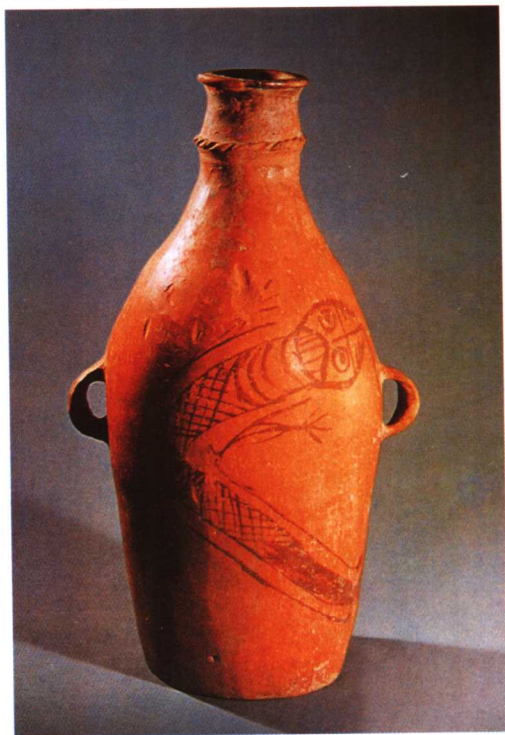
人面鱼纹彩陶盆

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葬具，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这件彩陶盆是儿童瓮棺的棺盖。仰韶文化流行一种瓮棺葬的习俗，把夭折的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在房屋附近。这件陶盆上画有人面，人面两侧各有一条小鱼附于人的耳部。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师“珥两蛇”的说法以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白衣彩陶钵

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口径22.6厘米，高16.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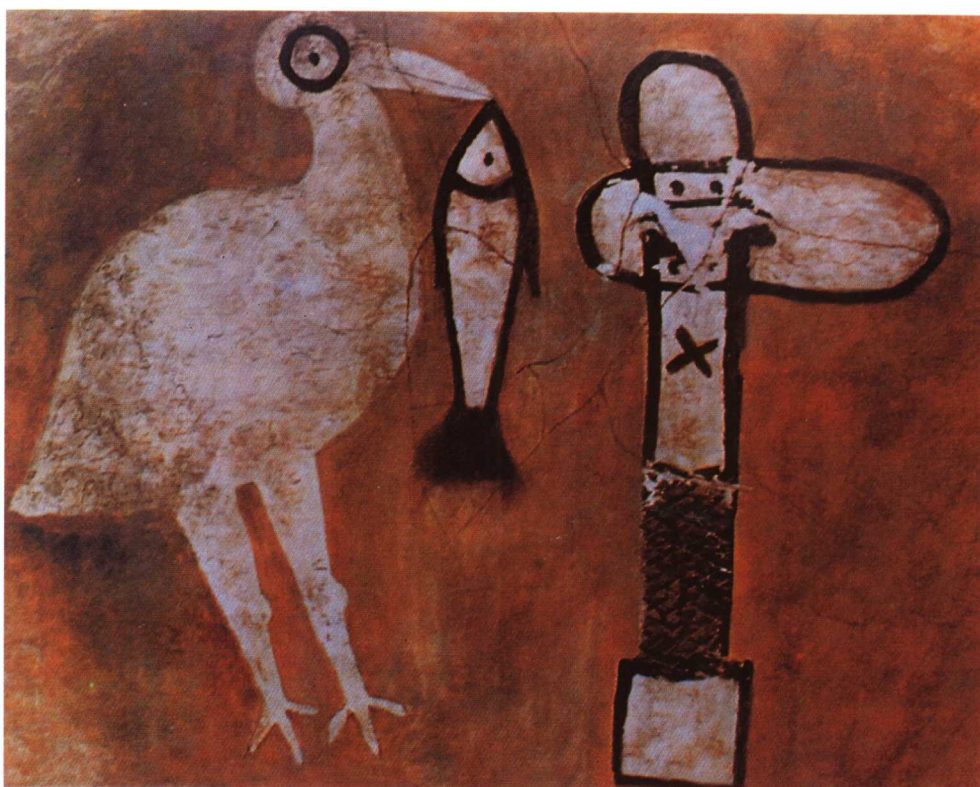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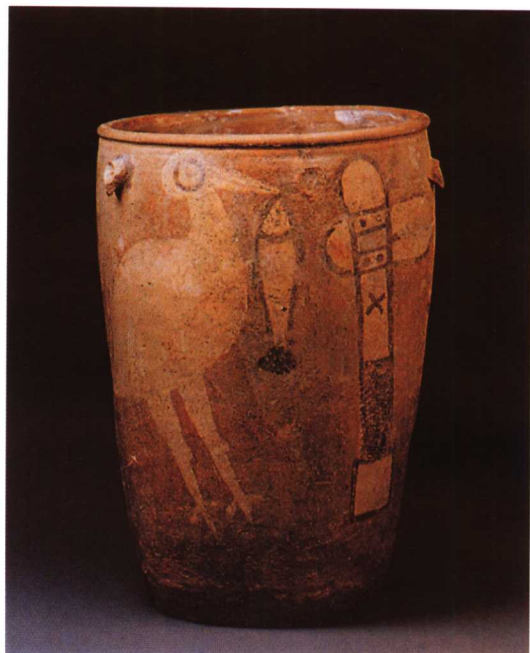
人面蛇形纹彩陶瓶

甘肃甘谷县西坪出土，口径7厘米，高38.4厘米。

(仰韶文化彩陶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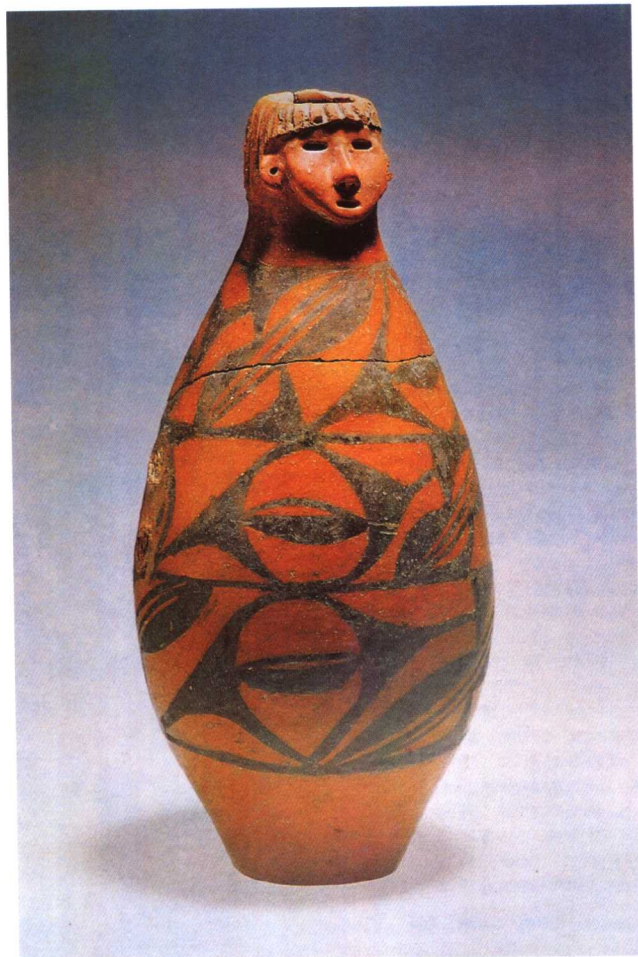
鹤鱼石斧图彩陶缸

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葬具，1980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高47厘米，缸的腹部画有一幅由鹤、鱼和石斧组成的图画。原始画师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鹤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来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这件陶缸出土时内盛一具成年人的骨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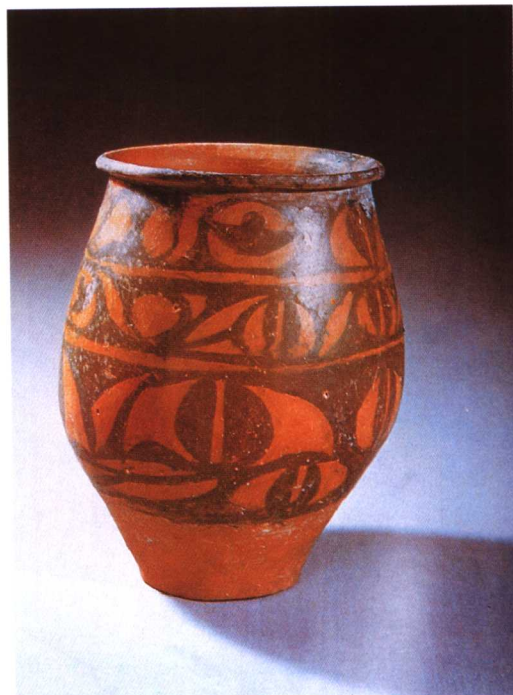
彩陶缸上的鹤鱼石斧图

(仰韶文化彩陶器之二)



庙底沟类型大口深腹罐

高 25 厘米，口径 16 厘米。腹上部图案分三层，以弧形三角、半圆形组成图案，第一层中有简化鸟纹。秦安县大地湾 1977 年出土。



庙底沟类型人头形器口瓶

高 31.8 厘米，口径 4.5 厘米，底径 6.8 厘米，细泥红陶。双腹耳已残，陶瓶上腹曾破裂，经当时的使用者粘接过。头的左右和后部披发，前额垂一排整齐的短发，眼和鼻都雕空成洞孔，两耳各有一穿孔。腹部以上施浅红色陶衣，黑彩，画三排弧线三角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秦安县大地湾 1973 年出土。



绘画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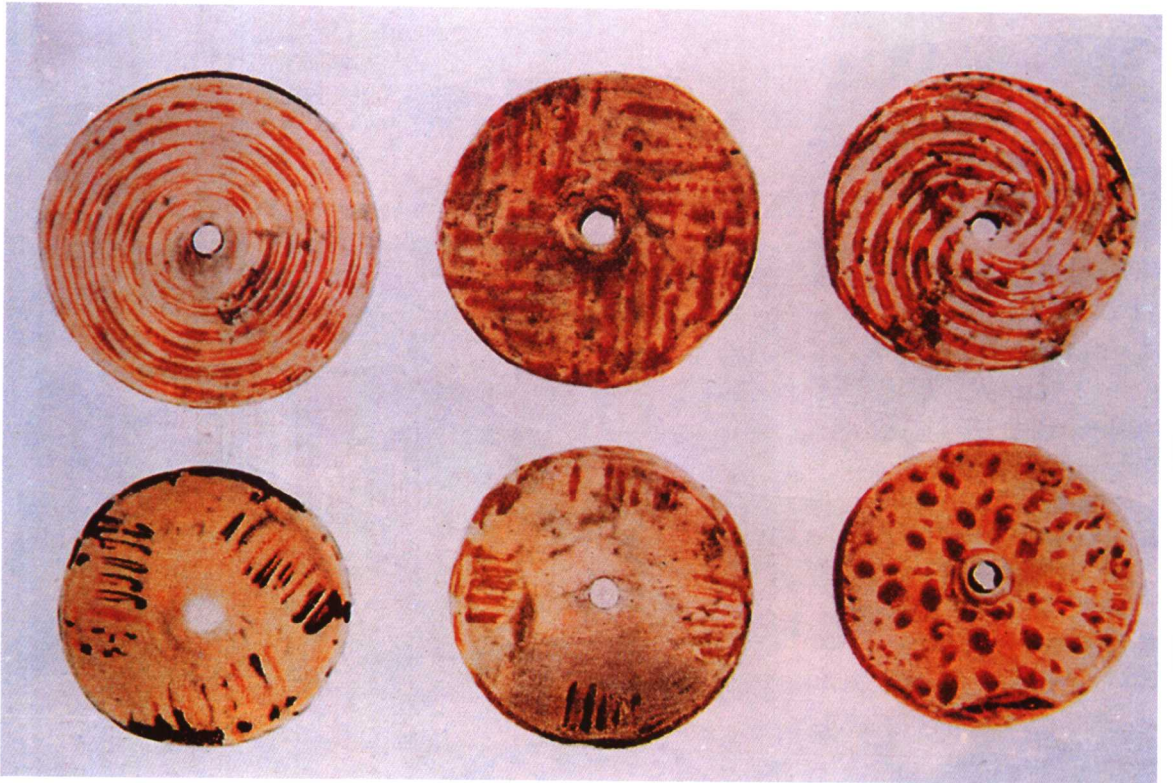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

(仰韶文化彩陶器之三)



陶塑动物

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高约 5.5 厘米 1977 年湖北天门邓家湾出土,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藏。陶塑动物一组数件,姿态各异:有仰首竖耳的小狗,有坐视观望的小猴,有展翅欲飞的小鸟,还有身上落了小鸟的狗等,造型生动,简单朴拙。



彩陶纺轮

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



“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长 16.6 厘米,残宽 5.9 厘米,厚 1.2 厘米。



骨 耜

长 18 厘米,刃宽 9.8 厘米。



稻穗纹陶盆

口径 30.5 厘米,高 16.8 厘米。



漆 碗

口径 10.6—9.2 厘米,高 5.7 厘米。

(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



玉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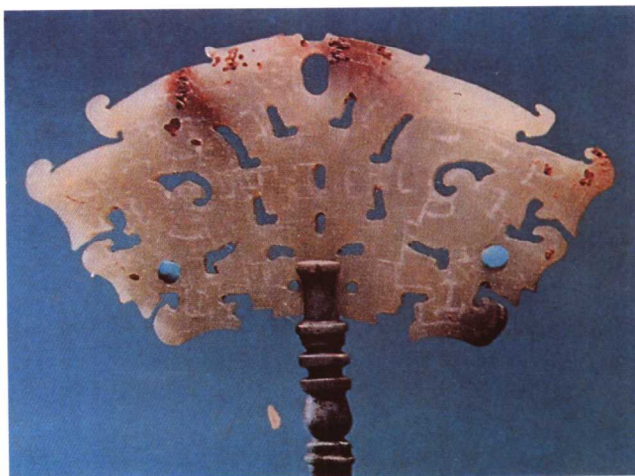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12号墓出土,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高8.8厘米。



玉琮局部纹饰



玉簪(长 10.3 厘米)



玉头(冠)饰(通长 23 厘米)



彩陶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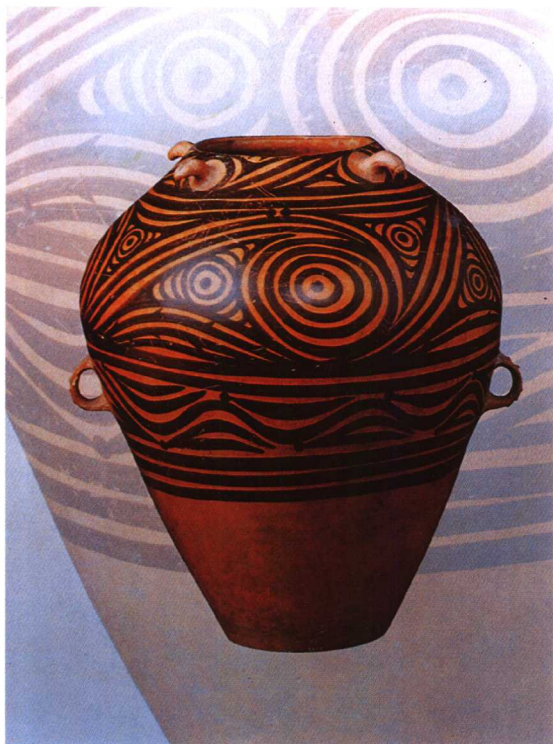
口径 22.4 厘米,高 26.4 厘米。



白陶鬲

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水器或酒器,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出土,高 14.8 厘米。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省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零星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其年代约始自公元前 4 300 年,公元前 2 500 年左右发展为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特征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这件白陶鬲是由高岭土经 1 200℃ 左右的窑温烧制而成的,胎壁较薄,质地却很坚硬,它的出现表现了制陶技术的又一新进步。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和陶器)



涡纹双耳四系彩陶罐

属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56年甘肃省永靖县三坪出土，水器或酒器，高50厘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橙黄陶黑彩为主，纹饰以弧线旋涡纹为特点。这件彩陶罐有4个大旋涡纹绕器一周，在2个大旋涡纹之间还绘有2个小旋涡纹，具有很强的动感，反映出原始先民对水这一具体的事物有着抽象的概括和表达能力。



舞蹈纹彩陶盆

属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水器，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高14厘米。这件陶盆的内壁上绘有3组内容相同的画面，表现了原始人集体舞蹈的情景，每组画面共有5人全部手拉手，面朝同一方向，每人都梳有一个发髻，并在臀部系一尾饰。舞蹈者动作协调，步调一致，宛然是在乐器的伴奏下，踩着一定的节奏翩翩起舞。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操兽尾跳舞的习俗在许多原始民族中都存在过，这件舞蹈纹彩陶盆再现了原始人操兽尾跳舞的场面。



刻纹双联陶壶

长 32 厘米,口径 11.3 厘米,1978 年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藏。壶红褐色夹砂陶质,胎质坚硬;广口敞沿,短粗颈连以圆蹄形分档双腹,颈部前后面及双腹边端,有月牙形小耳,上扎小圆孔;腹体刻线纹装饰,肩部刻脊线三条,内划短横线,以脊线为中心向腹体两边展开相对的折曲线,整体形象如二兽对首搏斗。



石磨盘



刻纹陶壶

高 16 厘米,口径 5 厘米,1978 年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藏。陶壶小口,窄唇,短颈,上腹丰阔,下腹曲收,小平底;上、下腹粘合而成,上腹下缘刻成花芽边,似蘑菇状;器表刻折曲线组成的带状几何形图案,折曲线内加刻不规则的竖直短线。

总 序

中华民族儿女泛称为“炎黄子孙”，这虽然是一种形象性的譬喻，但也给我们启示，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炎黄文化的源头和演进轨迹。

在文字尚未创造以前，我国远古时代的人物事迹，是依靠世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黄帝和炎帝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两位代表人物。这些传说后来经过文字记录和加工，保存在先秦的一些文献中。西汉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说：学者多称五帝的时代太久远了，《尚书》只讲到尧，其它古文献的记载多被认为是虚言，为儒者所不传。我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处，老人们往往称颂黄帝、尧、舜，和文献记载可相印证，可见并非都是虚妄之言，所以作为篇首，写了《五帝本纪》，叙述黄帝的历史，并涉及炎帝的事迹。

被称为“文明初祖”的黄帝距今多少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没有明确回答。传统说法为距今约五千年。所以人们习惯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未曾中断的五千年悠久历史。事实上，从我国考古学的成果来看，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的时间十分久远。五千年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一个象征性的概数。

我们知道，古代人们的共同体是由氏族、部落、部族集团逐渐融会成民族。正如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时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81页）今天的中华民族即包含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他们都对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伟大的贡献。追根溯源，在遥远的炎黄时代，已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基础。我们说黄帝、炎帝是中华民族初始有功德而受人尊敬的先祖，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为民族独立解放，为国家走向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领袖人物和文化教育界的中坚，都曾经以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宣传他们的伟大创业精神，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继承了这个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了炎黄文化研究。在学术研究过

程中,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编撰《炎黄汇典》的倡议。这个倡议得到会员和学者们的赞同。今天,倡议已经成为现实,厚厚的一套《炎黄汇典》将奉献给中华儿女们。

《炎黄汇典》是一部八卷本有关炎帝、黄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料丛书。20世纪80年代起,海内外炎黄子孙纷纷前往陕西黄帝陵、湖南炎帝陵等地寻根问祖,对炎帝、黄帝的生世、功德产生了浓厚兴趣,学术界就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文化展开了热烈讨论。适应这种形势,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炎帝、黄帝的书籍,主要内容大多是围绕当地炎黄历史纪念遗迹的。这些书籍受到了前往祭奠、观光的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欢迎。随着海内外“炎黄热”的不断升温,尤其是炎黄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局限于介绍一人一地的这类书籍,期望看到比较全面系统的有关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料。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经过反复考虑,感到有责任出面组织有关专家共同完成这项工作。这套丛书以汇集历代典籍、文献中有关炎帝、黄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料为基础,故定名为《炎黄汇典》。正当《炎黄汇典》着手编辑之时,“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这对《炎黄汇典》的组织编辑工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与鼓舞。学术界许多人士认为,为了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势必进一步向上追溯到五帝时代。司马迁《五帝本纪》中,把黄帝作为五位古帝之首加以记述,决非偶然。我们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并将其运用于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的研究,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历史将会有越来越清晰的了解与认识。《炎黄汇典》的编辑出版,如果能在文献资料的准备上,对五帝时代乃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发挥一些作用,那是值得庆幸的。

《炎黄汇典》所汇集的历史、文化资料说明,人们景仰炎黄二帝是由来已久、有充分理由的。以炎黄二帝为代表,包括蚩尤、嫫祖、仓颉等一批杰出人物,带领先民们披荆斩棘,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帷幕,写下了人类历史最初的辉煌篇章。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历史中,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也有过落后和屈辱。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中华民族历尽磨难,从开始觉醒,到站立起来,进而走上富强之路。我们终于洗雪了百年耻辱,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忘先祖,追怀古史,正是要赶上时代的步伐,以便在21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里,对《炎黄汇典》各卷内容作一简要说明:

《史籍卷》 摘选古代典籍、传世文献中有关炎帝、黄帝及其相关的历史资料。上起《尚书》的少数段落,下迄清末崔东壁《上古考信录》的某些篇章。

《方志卷》 选录全国地方志中有关炎黄二帝及其同时代表人物包括蚩尤、嫫祖等的记载。

《祭祀卷》 收录历代祭祀炎帝、黄帝的有关资料,包括礼仪、祭祀活动和祭文等。

《文论卷》 选编近代有关炎黄研究的重要著作和文章。上自辛亥革命前夕,下

至本卷发稿的 1999 年。

《考古卷》 概述与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相关、主要是距今大约七、八千年至五千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鉴于这些资料很多,不便选辑在篇幅有限的一卷中,因而采取著述的方法。

《诗歌卷》 汇集从先秦直到当代吟诵炎帝、黄帝等的各种体裁的诗歌。包括《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以及现当代新体诗等。

《民间传说卷》 精选从全国各地民间实地采风搜集到的有关炎帝、黄帝、蚩尤以及同时代其他英雄人物的口头传说故事,加以编辑。

《图像卷》 彩印全国各地有关炎帝、黄帝等的主要纪念建筑及其周围景观的照片。

八卷的体例大体一致,又略有差异。这是因为各卷主要内容都是有关炎帝、黄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的,但视角有所不同,资料来源各异,数量多寡悬殊。

这套丛书从 1995 年酝酿策划,1996 年开始组织专家学者拟定、讨论方案,并陆续着手搜集资料,整理编辑,到出版发行,经过了六年时间。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领导支持和精心组织下,《炎黄汇典》编辑委员会和各卷主编、副主编共同努力,互相配合,在资料搜集上力求其全,在编辑整理上力求其精。但是,由于学识所限,经验不足,重要遗漏和选材失当、编校疏忽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读者指正。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炎黄汇典》编辑委员会
二〇〇〇年六月

前 言

作为《炎黄汇典》的一卷——《考古卷》，顾名思义是用考古资料来分析阐述炎黄时代的史实，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炎黄汇典》各卷的编纂方法，是收集摘录文献记载中有关炎黄的史料和研究论著，本卷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在开始编纂本卷时，就感觉到考古学的实物史料、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有着它的特殊性，难以应用其它各卷那样的编纂方式。于是就与总主编和有关方面的学者商讨，按特殊情况作特殊处理。因而本卷有与其它各卷不一致之处，实所难免。

田野考古工作中发掘出来的实物史料，是炎黄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史传说的文献记载比较贫乏的情况下，考古史料更显得十分重要。中国以近代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始于1926年由李济先生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由中国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1931年由卫聚贤、董光忠两位先生在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后又有对其它遗址的调查、发掘，炎黄地区史前考古工作就此萌芽、生长，但其进程十分缓慢。解放后，考古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考古队伍。50年代就大规模地发掘了西安半坡和陕县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不仅在黄河流域，还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及其它地区，都先后开展了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积累了资料。由于当时田野考古工作的任务繁重，这支考古队伍又较年轻，出现了室内研究工作赶不上形势需要的情况。这在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是一种暂时现象，不足为奇的，但对《考古卷》的编纂、撰写来说，就增添了一定的难度。例如第六章《古老而奇特的图腾文化》，由于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内容不够充实，不得不引用一定数量的民族学资料和古史传说记载来加以说明。或许有的读者要问：为什么作者对这个问题不作专题研究呢？笔者认为《炎黄汇典》不是专题研究的著作，同时，图腾崇拜这种文化现象是一个大课题，不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而图腾崇拜在史前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其后的中国各族人们在思想意识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